

后汉书

精华注译

《二十四史精华注译》丛书

《后汉书》精华注译

《二十四史精华注译》丛书编委会编著

本卷主编 黎 虎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后汉书》精华注译

黎 虎 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7.25 字数:1000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定价: 27.50元

书号 ISBN7—81004—267—X/K·13

前言

黎虎

《后汉书》是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它与《史记》《汉书》在唐代以后并称为“三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

《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宋人范曄。范曄，字蔚宗，宋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淅川）人，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范曄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学问之家。远祖范晷，官至西晋凉州、雍州刺史。高祖范稚，“辟大将军掾”（《晋书》卷90《范晷传》）。曾祖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官至东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晋书》卷75《范汪传》）。祖范宁官至东晋豫章太守，以经学名于时。父范泰，甚为东晋权臣刘裕信任，仕至尚书常侍兼司空，与袁湛一起亲授刘裕“九锡”。刘裕代晋建宋后，加位特进，进位侍中。范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宋书》卷60《范泰传》）。这种家世环境对范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宋书》卷69《范曄传》。以下凡引此传均不另注），堪称多才多艺。他在政治上也颇有头脑，其时正值晋宋易代之际，十七岁那年（义熙十年，公元414年）东晋雍州刺史想任用他为主簿，他没有答应。不久，刘裕建“宋台”，掌握了东晋实权。范曄即投刘裕子义康门下，为冠军参军。从此他的政治命运便与这位日后的刘宋宗室连在一起了。刘宋建立后，随着刘义康的升迁，范曄的官职也随之而升。先后为尚书外兵郎、尚书吏部郎等职。

范晔虽然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却具有不拘小节、恃才傲物的性格特征。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刘义康太妃死，将葬之夕，范晔与友人在东府夜中酣饮，开北窗听挽歌为乐。刘义康对这种非礼举动大为恼火，左迁范晔为宣城太守。但后来范晔的外甥谢综当了刘义康的大将军记室参军，刘义康通过谢综向范晔致意，“求解晚隙，复敦往好”，于是二人嫌隙顿消，关系更加密切。

范晔对于当时的腐朽平庸的朝臣瞧不起，曾作《和香方》，以香药的性味比类朝士，极尽讽刺之能事。以“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比侍中、吏部尚书庾炳之；以“苓藿虚燥”比侍中何尚之；以“詹唐黏湿”比侍中兼右卫将军沈演之；以“枣膏昏钝”比左卫将军、光禄太夫羊玄保；以“甲煎浅俗”比侍中、太子詹事徐湛之。而以“沈实易和”比喻自己。他这样自然得罪了当朝权贵，于他本身的自全是不利的。

他不仅傲视达官贵人，甚至对于皇帝也并不驯顺。他善弹琵琶，能弹时新曲调，宋文帝很想听，屡次示意让他弹奏，他佯装不知，“终不肯为上弹”。有一次宋文帝饮宴正酣，请求范晔说：“我欲歌，卿可弹”。范晔不得不奉旨而弹。但宋文帝歌罢，范晔亦止弦，并不多弹。

范晔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对于宋文帝和他的亲信并不满意，而是满心拥护刘义康。史称义康“自强不息，无有懈倦，”“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宋书》卷68《刘义康传》）。后来，刘义康与宋文帝的矛盾终于暴发，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解除了刘义康的司徒职位，改授都督江州诸军事，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刘义康的遭贬，激起了包括范晔在内的刘义康亲信的不满，于是他们互相串连，图谋推翻宋文帝，拥立刘义康。元嘉二十二年（445）事情败露，范晔及其同党均被处死。范晔时年四十八岁。

在学术上，范晔并没有像当时一般学者那样走上儒学的路子，而是走上了治史的路子。元嘉九年宣城之贬，使范晔悒悒

不得志，于是开始潜心史学，“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在范曄之前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无虑有数十家之多。其中官修的《东观汉纪》，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范曄为什么还要另写一部后汉史呢？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他对于这众多的后汉史书，均不满意，于是，“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以什么样的体裁来重造后汉史书呢？范曄对当时流行的编年体与纪传体两种体裁作了对比，得出结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隋书·魏澹传》）。可见他是在对比了二体的优劣之后决定采用纪传体形式撰写东汉历史的。

范曄原定的计划，是要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范曄生前已完成十纪和八十列传，但十志尚未完成。范曄对于修志非常重视，自称“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可见他对修志自有周密的考虑。“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后汉书·皇后纪》引沈约《谢俨传》），即将完成之时，适值范曄被害，谢俨亦受牵连被杀，所撰志因之散佚。现在附于《后汉书》的八志，是晋人司马彪所撰。司马彪曾作《续汉书》83卷，其中八志共30卷。南朝梁刘昭注《汉汉书》，因范曄“及语八志，颇褒其美”（刘昭《后汉书补志序》），便将司马彪八志以补范曄《后汉书》之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附于《后汉书》之后的八志。

范曄《后汉书》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范曄之前的数十家后汉书已逐渐湮没，范曄之后，梁人萧子显所撰《后汉书》100卷，王韶所撰《后汉林》200卷，也都先后被淘汰。唯有范书风行天下。到唐朝时刘知几已说：“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曄）、袁

(宏)二家而已”(《史通·古今正史》),首推范曄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

为什么范曄的《后汉书》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战胜在他前后的众家后汉书而独领风骚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范书从编撰体例到史学思想,从史料价值到文学价值,都有它的过人之处和突出之点。范曄自诩,“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这话大体还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在编撰体例上,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在本纪部分,除了记述从光武帝到献帝的历代皇帝以外,又立皇后纪以记历代后妃。在范曄之前,《史记》和《汉书》虽然以吕后为本纪,但对于其余的皇后,《史记》列入《外戚世家》,《汉书》列入《外戚传》而置于全书之末。《后汉书》却将皇后升格为本纪,与皇帝本纪并列于书首。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空前的。刘知几对此曾提出诟病,说:“范曄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其未达纪传之情乎”(《史通·列传》)。后世如晁公武、陈振孙、洪迈等人,也“援引史通所指摘一二事,过相菲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其实,范曄将皇后立为本纪,是正确地反映了东汉历史的实际。东汉时期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皇帝多短寿而孱弱,皇后和外戚的势力空前膨胀,正如范曄所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后汉书·皇后纪序》)。皇后临朝与外戚专权,正是东汉政治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所以范曄以皇后为本纪,就能较好地反映东汉政治的演进过程,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安排。这一点何焯已经看到了,他说:“东京皇后,窦、邓、闫、梁、窦、何,临朝者六,其间殇帝、北乡侯、冲帝、质帝,皆未尝亲政,邓氏既立安帝,复临朝者十六年,遂终身称制。作《皇后纪》为得其实,虽然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变,未可议也”(《义门读书记·后汉书》。)

当然,范曄为皇后立纪也是有所本的,晋人华峤作《后汉

书》，“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晋书》卷44《华峤传》）。王隐作晋书时，也以皇后“谓之纪，而在列传之首”（《史记·外戚世家》《索隐》）。不过，华峤立皇后纪是从帝后间的夫妻关系着眼的，而范曄是从政治上的作用着眼的，两者的角度是不同的。皇后本纪并不能包括外戚之事迹，於是范曄将其“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后汉书·皇后纪序》），另以列传记载外戚，弥补了皇后纪的不足。

《后汉书》的八十列传是以朝代顺序和以类相从的方法进行编撰的。列传一至三，是两汉之际起义领袖和割据领袖人物；四至十二，是光武时的宗室王侯和二十八将；十二至二十四的传首人物，都是明、章、和帝时人，而分别以行止相近的人物或子孙合传；四十三至五十三的传首人物，是安、顺帝时人，也多分别有合传的人物或子孙；五十四至六十五，都是桓、灵、献帝时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是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九杂传；最后六篇是边族的列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内部铅印本）。

在这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所创立的众多类传。《后汉书》的类传有十个，其中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七个类传是范曄的首创。范曄的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东汉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面貌。类传的形式司马迁、班固等人已经使用，并非范曄的首创，但是类传之广泛多样是前所未有的。

宦官势力在东汉发展到颠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与外戚交替专权，成为东汉中期以后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范曄立《宦者列传》以反映宦官势力的发展状况，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范曄在这里揭露了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贪赃枉法，败乱朝政的罪行和“东都缘阹尹倾国”（《宦者列传》）的历史真相，使后人得以深刻了解东汉腐朽政治及其衰灭的缘由。

《党锢列传》是《后汉书》中最具特色的一个类传。外戚

宦官交替专权的黑暗政治，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强烈不满，尤为反对宦官势力，正如范曄所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党锢列传序》）。他们制造舆论，抨击朝政，被宦官集团诬为“党人”，先后两次大规模禁锢党人，“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同黑暗势力的斗争，范曄对于党人寄以满腔的同情，将“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详尽地记录了党人的事迹，有血有肉地反映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全貌，使我们今天得以充分了解东汉这场政治斗争的实况。

《文苑列传》是记文学之士的类传。重德轻文是古代的传统观念，《史记》《汉书》都曾为儒学家立《儒林传》，但没有为文学家立类传。《后汉书》首创此例，专为文学之士立一类传。这首先与东汉文学的发展有关，章学诚说：“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史通义·书教中》），道出了范曄创立文苑传的客观原因。汉魏以后，文学独立的趋势已日益明显，晋人荀勖作《中经》，将图书分类为四，甲部为六经，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史书，丁部为文集，文学已与儒林并列，自成一部了，到南朝时，文集风行，文学兴盛，文苑传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映。

《列女传》是《后汉书》中又一别具特色的类传。过去的史家很少注意记载妇女的事迹，范曄是第一个重视妇女问题的史家。他认为“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她们之中同样有许多值得记载的事迹，“而世典咸漏焉”（《列女传序》）。他除了将后妃记于皇后本纪，梁嫫、李姬等人各附家传以外，又将其余“才行尤高秀者”另归类而立列女传。范曄这一创举对后世影响颇大，以后不少史书也辟专传记述妇女事迹，有的史家把“列女传”改为“烈女传”，专记恪守“三从四德”的贞女节妇，已与范曄立“列女传”的初衷大相径庭了。

《独行传》记载了那些行为激诡绝俗的狂狷之士，他们有的“志刚金石，而克捍于强御”，有的“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有的“结朋协好，幽明共心”，有的“蹈义凌险，死生等节”（《独行传序》）。《独行传》的设立，也是对东汉社会风尚的客观反映。东汉统治者“尊重节义，敦厉名实”（顾炎武《日知录》），当时荐举征辟，以“名誉”作为重要条件，于是“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代选士设有“独行”科，范曄正是据此而为类传名目的。

《逸民传》记载了那些“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遁世避祸，自命清高之士。这种人在汉代也有一定代表性，当时统治者对这些“逸民”采取优容招徕的政策，“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逸民列传序》），以达到“举逸民天下归心”（《论语》）的政治目的，这些“逸民”除了一部分真正隐居不仕之外，不少人是“纯盗虚声”的，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逸民列传·周党传》），上下相欺，一时殆为风气。

《方术列传》记载医巫卜筮、神仙怪异的方术之士。刘知几对《方术列传》提出批评说：“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珪之玷，惜哉”（《史通·书事》）。不过，近人刘咸忻另有所见，他说：“东汉谶纬学盛，经生多请术数，而民间机祥禁忌之俗亦多，巫祝形法方士神仙之说，后世所行者，皆自东汉而盛，故此传不得不立”（《后汉书知意》）。从东汉方术之盛的时代特征而言，此传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客观反映。

除了标明题目的类传以外，在《后汉书》中凡是事迹相近或互有关联的人物，也采用以类相从的方法合为一传。而并不拘时代之先后。赵翼对此论之甚详，他说：“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宪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

汲、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综、陆康，皆桓灵时人，而目为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廿二史札记》）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范曄在《后汉书》中，贯穿着进步的历史观点。他说他写《后汉书》“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正一代得失”，这是范曄明确提出的写史目的，他要通过写史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史家对此有这样明确的认识的，司马迁说他写史是要“窥天人之际”，班固说要“穷人理，该万方”，提法都是比较模糊的。只有范曄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所谓“就卷内发论”，指的是他在纪传中所作的序、论、赞，而“正一代得失”，就是通过这些序、论、赞体现出来的。范曄在修《后汉书》时，非常着意于序、论、赞的写作，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对于这些序、论、赞也是颇为自得的，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于《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刘知几对于范曄的论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史家作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俚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史通·论赞》）。

范曄在他的序论中，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主张，这在《史记》这样一部通史著作中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在断代史中就比较困难了，班固的《汉书》在这方面表现了明显的缺陷，范曄则通过序论，打破朝代的断限，探求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例如在《宦者列传序》里，论述了宦官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指出

“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由周秦而两汉，着重论述东汉宦官势力发展的原因，围绕着女主、宦官、外戚、朝臣间的关系和矛盾而展开分析。《党锢列传序》论述了春秋、战国至秦汉士风的变化，指出战国因重计谋而尊说士，结果反而是“士之饰巧施辩，以要能钩利者，不期而景从矣”；汉高祖“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结果反而“轻死重气，怨惠必仇……成其俗矣”；汉武以后崇尚儒学，而“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桓灵之间，宦官专权，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裁量公卿，倬直之风，于斯行矣”。从这一历史变化过程中，范曄认识到“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悟出了历史现象向对立面转化的“理”（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内部铅印本）。

范曄在《后汉书》中，表现出倾向进步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王鸣盛评论道：“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十七史商榷》）。

一般来说，过去的史书都是为帝王将相立传的，范曄在《后汉书》中也并不例外，但是，在他的纪传中，却贯穿着对于公卿宰相和奸雄的贬黜和批判精神，例如对于“历事五帝”而长期高居于公台的胡广、揭露了他保持高官厚禄的诀窍——“温柔谨素，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引京师民谣：“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加以辛辣的嘲讽。在后“赞”中画龙点睛：“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后汉书·胡广传》），一个圆滑老练的官僚政客的脸脸跃然纸上。

对于外戚宦官为代表的邪恶黑暗势力，范曄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充溢着愤懑不平之气。例如外戚梁冀，尽情揭露其专权乱国、骄奢淫佚、割剥天下，及其徒党“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毆击吏卒，所在怨毒”（《后汉书·梁冀传》）的凶残面目；

对于宦官，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宦者列传序》）的滔天罪行。

《后汉书》揭露权势的丑恶与对节义的褒扬是相互结合的。他批评班固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后汉书·班固传论》）。他们对待节义的态度作为区分史家高下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他自己写作《后汉书》的态度。

范曄在《后汉书》中赞扬那些“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的人物，他在《党锢列传》中站在同情党人的立场，认为他们都是“天下善士”，表彰李膺的“执法不挠”，敢于“诛举邪臣，肆之以法”的刚正不阿。他由衷慨叹范滂母子“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在《逸民列传》里，范曄写他们的“守节”和“不屈”，称赞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在《独行列传》里，范曄推崇他们“蹈义凌险，死生等节”的高抗风标。

范曄反对佛教鬼神的思想，是他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南朝时，佛教在统治者的推动之下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思想领域围绕因果报应的有无和神灭神不灭的论争形成两军对垒。范曄是站在反佛鬼的阵线上的。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临刊前“又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在《西域传论》里，他在论述佛教东渐的历史时，指出佛教所说的神怪在张騫、班超时代并没有，而是后起之事，他提出疑问：“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这是从佛教发展过程去揭露佛教宣扬的神怪的虚妄，认为“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公开对神不灭和因果报应论提出怀疑。

范曄也反对图讖。李通曾以图讖说光武帝，范曄指斥为“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后汉书·李通传》）。他指责“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方术传序》）。他在《桓谭传》

中著录了其论图讖疏，在《张衡传》里详细记载了其请禁图讖疏，有力地揭露了图讖的欺伪。

《后汉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虽然范曄距东汉已有二百余年，但是他是删众家后汉书而作《后汉书》的，当时他可以参考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例如《东观汉记》，这是东汉时学者奉命在“东观”修撰的国史，先后有班固等多人参与修成的。此书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是非常高的。范曄就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后汉书》的。此外可供参考的关于后汉史籍，不啻数十家之多。范曄以过人的史才加以去粗取精，删烦补略，才写成这部巨著。刘知几对此评论道：“范曄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史通·书事》），又说：“范曄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通·补注》）。今天，众家后汉书均已失传，唯有范曄《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仍存。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史书，他所容纳的史料与纪传体是有距离的。而袁书中的精华和重要史料，大都被范书所吸取。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东汉的历史，主要就是依靠范曄的《后汉书》。

《后汉书》的史料价值还在于他记载史事的详赡和广泛，他不仅记述了统治者的事迹，也记录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事迹，而十个类传反映当时政治大事和社会生活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他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比《史记》《汉书》更为丰富，在这些传中保存着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例如《西域列传》中所记的材料，都是自“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取材于经略西域二十年之久的名将“班勇所记”（《西域传序》）。

在《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中，记载了许多人物的奏疏和文章，如《崔寔传》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载其《陈时政》一疏，《冯衍传》载其《说廉丹》一书，《说鲍永》一书，《王符传》载其《潜夫论》中五篇，《仲长统传》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中三篇，《张衡传》载其《客问》一篇，上疏《陈事》一篇，《请禁图讖》一篇，《蔡邕传》载其《释海》一

篇，《条陈所宜行者七事》，《刘陶传》载其《论民饥疏》，《左雄传》载其《陈政事疏》，《荀爽传》载其对策，《荀悦传》载其《申鉴》等，都是有关时政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也是非常高的。范曄从小便“善为文章”，中年以后“文章转进”，有了更大的提高。他对于写文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追求，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託，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狱中与诸甥侄书》）。在骈偶文章发展到形式主义的南朝时期，范曄大力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无疑是进步的文学主张。范曄在《后汉书》的写作中，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后汉书》以优美的文笔，质直翔实地记载了万千史事，条分缕析，雁行有序，娓娓动人。许多列传就是优美的历史散文。他的序、论虽然也采用了骈偶的形式，但是，其句法之灵活，辞采之精美，音调之谐和，故实的征用，都比《史记》《汉书》的论赞前进了一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阶段，标志着骈文形式之进入成熟阶段（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范曄不仅立《文苑传》以记文学之士，而且在其他许多列传人物中，著录了他们的诗赋和文章，例如：《崔骃传》载崔篆《慰志赋》一篇，崔骃《达旨》一篇，《班固传》载其《两都赋》《明堂辟雍诗》及《典引》篇，《杜笃传》载其《论都赋》，《傅毅传》载其《迪志诗》，《崔琦传》载其《外戚箴》，《赵壹传》载其《穷鸟赋》，《刘梁传》载其《和同论》，《边让传》载其《章华赋》等，都是文学优赡，辞采壮丽之篇。通过范曄的著录，东汉一代文章诗赋得以保全不少，为后世研究东汉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过，由于范曄过于重视史书的文采，在记载史实上不免有所影响。清人顾栋高说，范书“比谢承书、东观记，所载人

物削去十之四五……其中遗美实多……是使可传者，不获显于后世矣”（见惠栋《后汉书补注·序》）。有些传记，为了文字上的简炼，损害了对史实的记载，产生了概念化的弊病。以《虞诩传》为例，司马彪《续汉书》记“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归还，户数万，人给家足，一郡无事”。而范书改为“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续汉书》中具体的数字增减，在范书中成了一个泛泛的概念。这对研究当时经济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不过，总的来看这种情况不算太多，美玉之瑕在所难免。

《后汉书》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从各个方面不断对它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对范书的注解。最早给范书作注的是南朝梁人刘昭。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世称博悉”（《梁书·刘昭传》）。当时各家后汉书仍存，所以他可以对照以注范书，主要从史实方面进行补注，可惜他的注后来散佚，只剩下“八志注”了。到了唐朝，李贤又为《后汉书》作注。李贤是唐高宗的儿子。协助他作注的有张大安、刘纳言、格希玄等人。李贤注以训诂为主，史实上也作了些补充。今天通行的《后汉书》即采用李贤注。后代比较著名的注，有清人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援据博而考核精”（顾栋高序）。王先谦在惠栋补注的基础上，又作了《后汉书集解》，广泛网罗众家的研究成果，注释翔实，很便于参考。

其次，历代学者对《后汉书》作了一些补充和考订。范曄只完成《后汉书》的纪、传，所拟十志未能完成。最早为范书补志的，还是梁朝的刘昭。他在注《后汉书》时，见范曄推崇司马彪的《续汉书志》，便将其八志三十篇补入范书，并为之作了注。八志注现在已不完全，其中《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已佚。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孙奭奏诸朝廷将司马彪八志与范曄《后汉书》合刻，从此两书合而为

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通行的《后汉书》本子。由于司马彪八志不够全面，后来有的学者又为它补志，如清人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等。此外，也有学者为它补表，最早补表的是宋代的熊方，他作《补后汉书年表》十卷。清代学者所补最多，如褚以敦的《熊氏后汉书年表补》，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以及万斯同所补诸表等。

现存《后汉书》的古本，以南宋绍兴本为最完整而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标点本即以绍兴本为底本，又与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作了反复对校，并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是我们现在阅读《后汉书》最理想的版本。

《后汉书精华注译》是《二十四史精华注译》丛书中的一种。《后汉书》博大精深，卷帙浩繁，全书将近二百万言，为了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吸取《后汉书》的精华，我们编选了这本《后汉书精华注译》。我们编选这本注译的主要原则是：

一、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文采斐然。选文力求对于东汉一代历史能够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给读者。选文收入了东汉时期杰出及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某些典章制度，重要民族关系，有代表性的思想文化的篇章。选文范围只限于本纪列传，八志部分没有入选，这是因为八志为司马彪所撰，而其撰述水平与范曄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序、论是范曄的得意之作，在《后汉书》中颇具特色并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次在选编时，尽可能把有关纪传的序、论选入，以见范曄的史识和文采。《后汉书》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赞，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其中虽有新意，但多不免内容笼统，因此这次没有选入。

二、既有思想性和人民性，又有艺术性和借鉴作用。以《方术列传》为例，传中所记方士有二十余人，其中如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的撰酒灭火，樊英的